

# 导论：中国近代文化边缘 人群体透视

人类学家、社会学家概定：“边缘人知识分子”(marginal intellectual) 乃是指同时生活于存在某些彼此冲突的价值标准或行为规范的两个文化之间的某一社群。以容闳、伍廷芳、严复、孙中山为代表的文化边缘人构成了近代中国社会一道奇异的风景线。探寻该群体的出现、心态、归宿，无疑会加深我们对伍廷芳思想经历的理解，从而深化对中国近代史的研究。

## 一、近代中国由中心沦为边缘的伴生物

文化边缘人在中国的出现，当是近代中国由世界中心沦为边缘的伴生物。

近代化运动实质上是一场全球一体化运动。随着欧美国家在近代历史进程中的异军突起，更伴随其早期殖民扩张，人类文明演进的格局发生了根本性的变化。西欧诸国在迈向人类社会更高层次的转变中，捷足先登，脱颖而出，为世界诸民族提供了一个可供参考的现成示范模式，成为人类新生代的文明发源地。该文明融合吸纳了人类早期诸文明的精华，“甚至向已死的文明

借鉴，<sup>①</sup> 显现出能量大、扩散强的特点。它如同一副质地坚实的网罗，将人类生活繁衍的分散诸地联为一体，并强行裹挟着并肩前行。人类社会的舞台走向统一与集中。到 19 世纪初叶 全球一体化运动初显端倪。可以说，世界近代史即是一部由分散到整体的历史，也即世界后进民族国家由中心沦为边陲的历史。在地理大发现之前，人类社会呈现多极并立的格局，诸种文明辐射的范围各以其文明内存能量的大小为半径波及周边，形成了众多文明圈。本人认为，汤因比的文明形态理论是迄今为止学术界关于文明类型划分的权威。他认为人类历史上曾先后存在过 23 种文明 这些文明包括已经死亡的埃及社会、米诺斯社会、苏末社会、赫梯社会、巴比伦社会、印度河流域社会、中国商代社会、玛雅社会。此为第一代文明。古代希腊社会、叙利亚社会、古代印度社会、古代中国社会、安第斯社会、墨西哥社会、尤卡坦社会。此为第二代文明。现在仍然存在着的第三代文明有西方社会、东正教社会（内分为拜占庭东正教社会和俄罗斯东正教社会）、伊朗社会和阿拉伯社会（二者现合为伊斯兰教社会）印度社会、远东社会（又可分为中国社会和朝鲜—日本社会）。<sup>②</sup> 在这些文明中有的 是亲子代之间的嬗递关系，有的则是空间上的并存关系。从第一代的 8 种文明来看，人类最初的文明是在彼此隔绝的状态下发生的，即文明是异源的、异质的。所有这些文明由于受到人类征服自然、改造自然能力的制约 都未能呈现出王者之相 普照环宇 取代他种文明。

〔法〕费尔南·布罗代尔：《资本主义论丛》中央编译出版社 1997 年版 第 157 页。

〔英〕汤因比：《历史研究》上册 上海人民出版社 1966 年版 第 43 页。

然而 曾几何时 随着新航路的开辟 和资本主义这一新型社会制度在西欧的确立 文明间的封闭性、分散性趋于瓦解。导源于古希腊文明的西洋文明 在强大武力的配合下 以其强劲的穿透力 辐射全球，遍播带有欧式印记的文明。人类社会新一轮次的中心 边陲化进程拉开了序幕。在同西洋文明较量中惨败的诸多文明已不再具有往昔的辉煌 其曾经照耀、滋润过的地带已不再是文明的中心 而蜕变为西洋文明的边陲。“中心”、“边陲”的概念 与前相比，无论是在内涵上还是在外延上，均已发生了根本性的变化。“所有现存的文明 无论是主要的还是次等的 在最近二百年中都已成为西欧文明的边缘。”<sup>①</sup> 西洋文明取代了众多文明而雄居文明之首 他种文明已经丧失了原有的意义 其曾经影响过的地域变成了殖民地或半殖民地。“如果说在 16 世纪以前人类各文明基本上是在一种相互隔绝的状态中独立发展，彼此间的冲突只是一些无损于历史主题的小插曲 那么在 16 世纪以后的世界整合或一体化的过程中，西方与非西方之间的文明冲突则构成了历史的主旋律。”<sup>②</sup> 当然 由于文明稳定性的强弱不同 内部结构的差异 世界诸文明抗拒西洋文明的结果也不尽相同。那些内部构成松散的文明 很快就被西洋文明所同化和取代 如非洲、澳大利亚和拉丁美洲。当西方殖民者到来时，这些地区尚处于旧石器的原始状态或文明的黎明时期，尚未经历“哲学的突破”（“philosophic break-

〔美〕菲利普·巴格比：《文化历史的投影》，上海人民出版社 1987 年版 第 204 页。

赵林：《人类文明的演化趋势——兼论亨廷顿的“文明冲突”》，《中国社会科学季刊》（香港）1995 年春季卷 总第 10 期 第 153 页。

through”）而建立起一套理论化和普世性的宗教——伦理价值系统，在精神文化方面差不多仍处于一种蒙昧未开的空白状态。所以西方在这些地区的殖民活动几乎没有遇到什么深层的文化障碍。西方文化很快变成了这些地区和民族的主流文化，操纵着他们的精神世界。那些结构严密、稳定性强的文明则极具韧性，民族文化的底色保持相对完好。如中国、印度及伊斯兰世界。

文化概念上的“边缘”与“边缘人”是政治中心与边陲的伴随物。自 19 世纪 40 年代被强行纳入世界资本主义文明循环圈内始，中国社会呈现出一幅动荡不安的转型图景：中国的社会结构开始由农耕社会向工业社会转型，从封闭社会向开放社会转型，从同质的单一性社会向异质的多样性社会转型，从伦理性社会向法制性社会转型。中国社会的主体——全体国民也在从传统人向现代人转型。现代人格转型的突出标志便是一种不同于已往各代人格特质的“新生代”的出现。这种“新人类”即是人类学家所称的“边缘人”。

## 二、徘徊于两种价值标准下的尴尬人

著名美籍华裔人类学家许烺光先生对文化“边缘”现象和“边缘人”心态特征有过深刻剖析。他自称：“我是一个‘边缘人’。我出生并成长于一种文化环境中——在那里，生活停滞，大部分人的生活几乎完全可以预知，后来我被从这一文化中赶了出来，到另一种文化中生活和工作。在后一种文化中，人们渴望变化，因为它本来就追求进步，万物与众生的面貌总是变化不居的。处在对比如

此明显的两种文化环境的人，本来就徘徊于每种文化的边缘。他自己就像是漫步于这两种文化边缘上的两个人一样，时常接触。’<sup>①</sup>

由此可见 文化边缘人的出现乃是社会转型过程中 两种或两种以上文化交流渗透的产物。一般说来，文化的传播尤其是强势文化的传播是从一极到另一极，经过传播者——讯息——媒体——阅听人——效果五个阶段，从方向性上说是顺时直线式的。弱势文化的吸纳接受则恰好相反，在方向性上是逆时曲线式的。文化边缘人走过的心路历程与此大致相同。文化边缘人大都具有求真求实 不囿于既成文化积淀 勇于抛却传统观念等品质 其心态是开放的而非封闭的，其行动是开拓的而非守成的。对异质文明的体认多经历困惑、尝试、模仿、认知等过程。对传统文化的态度则是认同、怀疑、改造、重构。伴随这一重建过程的结束 体现出边缘人思维方式、价值取向、道德标准的转型。在其言行中往往是新旧皆存、中西均有 但文化的底色已非传统 也非传统与现代性的对等 而是现代性多于传统性 世界性重于民族性。边缘人的人生旨趣代表着时代潮流奔腾的趋向 昭示着后进国家、民族的演进大势。边缘人是旧世界的盗火者，新世界的轮廓将在其所盗的熊熊大火中冉冉凸现。

然而，边缘人的境地又是两难的。他们一方面是两种乃至多种文明交流沟通的使者 在异质文明间架起了一座沟通的桥梁 文

〔美〕许烺光：《美国人与中国人 两种生活方式比较》 华夏出版社 1990 年版，第 3 页。

明间的交流将通过他们而趋向融合贯通。英国著名作家 D.H. 劳伦斯就曾说过：“所谓边缘人就是那些处于人类相互理解边缘的人，他们始终在拓宽着人类知识的新领域——以及人生的领域。”<sup>①</sup>另一方面，边缘人的角色定位——跨越两种文化，参与两种文化的冲突与对立，又使他们往往被两种乃至多种文明所拒斥，身处“既是”又不是”的尴尬境地。既不能对其中任何一种文化群体的价值标准忠贞不渝，又不能为他所认同的任何一种文化群体所充分接受。边缘人尤其是在社会转型早期的边缘人总是孤独的、失望的。他们具有拓荒者的勇气，在举国多半酣睡时，敢于向传统发起挑战，做出诸多被世人视为“异端”的举动，但他们却没有能力得到社会的呼应、认同。社会依旧按其原有的惯性递进着、演化着。

伍廷芳生于 1842 年，恰好是东西两大文明间第一次正面碰撞结束之时。拥有五千年辉煌历史的华夏文明在同西洋文明的首次较量中铩羽而归。中英之间不平等条约的签订，标志着华夏文化中心地位的旁落和“中国中心观”的破产，预示了中国开始由世界的“中心”衍化为西洋文明的“边缘”。政治边缘化必将孕育出文化边缘人。广州、香港地处中西文明交流要道，东西文化最早在此遭遇，为近代中国文化边缘人的诞生提供了肥沃的土壤。广州、香港成为文化边缘人的温室和摇篮。开近代海外留学之风的容闳、黄宽、黄胜全都是广东人。从人类学的角度看，他们应当是近代中国的首批文化边缘人，在他们的身上几乎体现出了边缘人的全部特

<sup>①</sup> 引自《劳伦斯书信选》北方文艺出版社 1988 年版。

征。当绝大多数学生以沉默来回答勃朗先生的出国邀请时，是容闳他们挺身而出 毅然前往。边缘人必具的冒险性、拓展性显露无遗。身居异国他乡，西洋文明的现成模式为边缘人提供了一个对比示范的标本。随着知识的增多，边缘人的内心痛苦必将与日俱增。容闳对此有过精细的心理描述：

“予当修业期内 中国之腐败情形 时触予怀 迨末年而尤愈。每一念及 辄为之快不快 转愿不受此良教育之为愈。盖既受教育 则予心中之理想既高 而道德之范围亦广 遂觉此身负荷极重。若在毫无知识时代，转不之觉也。更念中国国民，身受无限痛苦，无限压制。此痛苦与压制 在彼未受教育之人 亦转毫无感觉 初不知其为痛苦与压制也。故予尝谓知识益高者 痛苦亦多 而快乐益少。反之 愈无知识 则痛苦愈少 而快乐乃愈多。快乐与知识，殆天然成一反比例乎！”<sup>①</sup>

“洋装虽然穿在身 我心依然是中国心”唱出了海外游子的强烈归宗感。留学生作为弱国的代表 在沐浴西洋文明的同时 内心膨胀的是民族主义感情和强烈的中国人意识，从而陷入边缘人知识分子的认同紧张。对故土的深深眷恋和对民族式微的痛心，必将促使边缘人知识分子立志报效祖国，为中华崛起而学习。容闳的经历足以证实此点。容闳在升入耶鲁大学前经济拮据，处境艰难 有人愿出资赞助 条件是毕业后做传教士布道。容闳对此断然拒绝。他说：“予虽贫 自由所固有。他日竟学 无论何业 将择其

容闳：《西学东渐记》，岳麓书社 1985 年版，第 61 页。

最有益于中国者为之。’<sup>①</sup> “盖人类有应尽之天职，决不能以食贫故 遽变宗旨也。’<sup>②</sup> 大学毕业前，容闳已在为将来报效国家作规划；予意以为 予之一身既受文明之教育 则当使后予之人 亦享此同等之利益 以西方之学术 灌输于中国 使中国日趋于文明富强之境。’<sup>③</sup> 1872 年中国首批幼童赴美留学即是容闳这个边缘人报效祖国的行动写真。

身受两种乃至多种文化熏陶，边缘人的言行，按传统的观点看 大都带有‘离经叛道’的色彩 因而边缘人归国后 多经历一个艰难跋涉的过程。容闳结束了 10 年留美生涯于 1855 年返回中国 他所能谋到的职业也只有海关翻译 洋行代理商。至于所提具有资本主义色彩的七项建议 太平天国没有采纳 曾国藩、李鸿章等洋务派也没有采纳。即使后来成行的派遣留学生计划，也历经坎坷 归国 17 年后方实施 且 10 年后“此百二十名之学生 遂皆于 1881 年凄然返国。’<sup>④</sup> 容闳的教育救国方案终成泡影。银行计划、铁路计划也统统归于失败。最后又因参加戊戌变法而遭通缉，出逃美国 客死他乡。纵观容闳的一生 其虽有‘甚愿为中国而死，死固得其所’<sup>⑤</sup> 之壮志 但传统的专制王朝最终拒斥了他 留下的只是一声壮志未酬身先死的英雄哀叹。

就中国近代边缘人的沿革变迁看，本书的主人公伍廷芳应当

容闳：《西学东渐记》，岳麓书社 1985 年版 第 58 页。

同上，第 59 页。

③ 同上，第 62 页。

④ 同上，第 141 页。

⑤ 同上，第 157 页。

属于第二代边缘人。伍廷芳生于新加坡，求学于香港，1874年自费赴英学习法律，1877年获大律师资格归国。1882年起仕清28年，官至外务部侍郎、刑部侍郎。同属边缘人，伍廷芳与容闳相比较，有很大的相似性，但又有巨大的差异性。所谓的相似性，即在言行中体现出了边缘人独有的特征，身跨两种乃至多种文化背景，思维方式、价值观念、人生旨趣与时人迥然不同，身负传统文化基因和未来文化使命，报国宏愿备尝艰辛。但终其两人的一生际遇，伍廷芳又与容闳有差异。容闳一生的悲剧色彩远远重于伍廷芳。伍廷芳则在峰回路转中基本实现了人生的最高追求，完成了边缘人的历史使命。伍廷芳所经历过的这段历程，我们将在本书中予以深入提示。

造成容闳、伍廷芳人生际遇的不同原因，主要有以下三点：

第一、生活时代不同。容闳生于1828年，比伍廷芳大了整整14岁。1855年学成归国，也比伍廷芳留英归来早了22年。这22年的差距，在很大程度上决定了两人的命运。容闳回国时，正是中西两大文明第二轮冲突爆发的前夜。中华帝国的统治集团对东西方之间的巨大差距没有清醒的认识，对世界发展的大势依旧茫然无知。虽有林则徐、魏源在第一次鸦片战争前后有奔走呼号，但“师夷之长技以制夷”的警世明言并没有得到社会舆论的首肯和体认，最高统治集团依旧沉浸在“天朝上国”的梦幻中，徜徉于“天子有道，狩在四夷”的神话里。1840年第一次鸦片战争留给清朝统治者的只是对往昔盛朝的加倍留恋和对传统大国统治模式的更加顽固的据守。至于从战略高度上审视世界局势，更新观念，制定切合实际的国家大策，则根本无从谈起。统治集团念念不忘的只是如

何化解中英战争后天朝上国尊严的丧失，如何重铸中华帝国的神圣灵光。因而当欧美殖民者提出‘修约’要求时，清朝咸丰帝关心的只是如何阻止外国公使进驻北京，确保上国神威免遭亵渎，甚至不顾国力的衰弱被迫以战争来捍卫。

可以说，容闳归国之时，腐朽顽固的铁幕依旧笼罩着神州大地。处此社会氛围，作为异化的边缘人是极难得到社会认同的。至于发挥所学改造社会，简直是与虎谋皮。可供容闳选择的只能是南下香港，北上上海，充当翻译、洋行代理商。正统职业、中心社会，容闳难以插足。仕清多年，仅博得了一个四品职衔。容闳成为传统社会的弃儿。

伍廷芳则幸运得多。当他 1877 年留英归来时，中国社会已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第二次鸦片战争成为社会变革转型的加速器。历经战争的浩劫，中华大地痛定思痛。侵略者用铁与火的事实，迫使清朝统治集团承认，如今的欧美列强决非昔日的蛮夷狄貊可比。传统文化并非尽善尽美，无懈可击，中国正面临“数千年来未有之变局”。林则徐、魏源首倡的“师夷长技以制夷”变成了专制集团部分官员的自觉和无奈的抉择。中国在“富国强兵”的旗号下，迈出了近代化的第一步。了解西方，学习欧美，成为活生生的现实。当局的提倡，社会舆论的导向，为边缘人建功立业营造了一个较前十分有利的社会环境。这就是郭嵩焘、陈兰彬、张之洞、李鸿章等争相罗致伍廷芳的真正背景。

生存空间的大与小，决定了伍廷芳、容闳个人才学发挥的程度。

第二、知识结构的差异。“社会分工的结果，把人们的社会功

能细密化，使得个人与社会的关系趋向以单纯的职业关系为核心，科技的发展带来了职业的专业化，也带来了性向高度化的情形。<sup>①</sup> 这是在社会转型期摆在知识分子面前的一个难题。“通”“博”是传统知识分子学术成就的最高追求。与此相匹配的是以农业为主、家庭手工业为补充的中国旧式生产方式。社会的主体——农民既是农业生产者，又是家庭手工业者，社会分工极不明显。建构在此种经济基础之上的传统读书人的知识结构显得单调贫乏，其所知所学亦不外乎是以儒家经典为教本的传统文化的再传播。注重人文胜于格物，强调知理多于求真。此种“通”“博”绝非学理意义上的“通”“博”。

随着近代化运动的启动，现实对专门人才的需求有增无减。拥有专业特长的专门人才成为社会的宠儿。就容闳、伍廷芳的学术素养、知识结构来看，两人存有极大差异。容闳 1845—1854 年留学美国完成了中学、大学学业，成为耶鲁大学的毕业生。他虽然具备了相当的学术素养，但还不能算作一名真正的人才，充其量只能是一个人才的半成品。他最擅长的是“英文论说”<sup>②</sup>，曾两次获得头奖，数学一科则常不及格。严格说来，英语只是一门工具，不能视为专业。归国后，容闳四次失业，曾一度靠译书为生，不得不进行再深造，曾去香港专攻法律，后因遭到英籍律师的拒绝未能完成。专业知识的匮乏成为容闳就业选择连连受挫的根源之一。

伍廷芳则称得上是一名专门人才。早年就读香港，接受了系

汤学智、杨匡汉：《台湾暨海外学界论中国知识分子》，河南人民出版社，1994年版，第64页。

容闳：《西学东渐记》，岳麓书社，1985年版，第60页。

等的西方教育铺垫了良好的西学素养。任职港英高等法院，创办《中外新报》积累了丰富的实践经验与工作能力。尤其是 1874 年自费留学英国，专攻法律，知识结构发生了质的变化，实现了由博而约、由通至专的飞跃。1877 年返回香港时，伍廷芳已经是一名大律师，一名学有所长的专门人才。大律师一职为他赢得了无数殊荣，更为他步入政界、踏入政治中枢铺设了一条坦途。这可以伍廷芳归国后地位的变迁为据：初在香港出任大律师；1877—1878 年任港英政府考试委员 参与选拔官员；1878—1882 年任香港保良局副主席，负责社会治安，保护妇幼，组织救灾；1880 年就任港府立法局议员，开启了华人进入港英政府参政议政的先河。短短数载，伍廷芳留下了一串串耀眼的脚印，填补了一项项香港历史的空白。也正是因为其所具有的法律特长，伍廷芳得到了清廷及其官员的青睐。郭嵩焘、陈兰彬争相邀请，李鸿章则不惜以年薪六千金的高价将其罗聘帐下，待为座上客，视为中外交涉的肱股。

专业特长的有无，决定了容闳、伍廷芳这两位边缘人在近代中国国际遇的差异。人创造了历史，历史又选择了人。

第三、性格上的差异。“性格”一词最早见诸于希腊文 原为雕刻，后转意为印刻、标记、特征，广义指人或事物互相区别的特征。中国心理学界把性格理解为一个人在现实稳定态度和习惯化了的行为方式中所表现出来的个性心理特征。它最能表现一个人的个性差异。<sup>①</sup> 性格差异决定了人们生活方式的不同，影响着人们在

叶奕乾、孔克勤：《个性心理学》，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 1993 年版 第 171—172 页。

现实生活中的进与退、得与失。容闳、伍廷芳在个性心理上存有极大的不同。就个性类型划分，容闳是稳定外向型，在气质类型上则属于多血质，特征是善交际、开朗、健谈、活泼，有领导能力。其自传《西学东渐记》中无不流露出此点。早年勇随勃朗校长留学美国，在上海不畏强暴痛殴洋水手，均表明容闳个性心理上的开朗、活泼、冒险性。管理‘兄弟会’、图书司理、同学饮膳，结识众多学生，则表现出了容闳个性心理上善交际、有领导才能的一面。容闳对此曾自述道：“余熟悉美国情形，而于学界中交游尤广。予在校时，名誉颇佳，相识之人尤多。”<sup>①</sup>伍廷芳则与之不同。在个性类型上，伍廷芳是稳定内向型，在气质类型上则属于粘液质，特征是谨慎、深思、平静、有节制、可信赖、性情平和、镇静。同样是作为留学生，伍廷芳曾与一英国学生相对而坐多日，虽欲与之交谈，但终未如愿，表现了伍廷芳谨慎、深思的个性心理。在回忆早年留英时，伍廷芳曾说过：“我几乎每天都到那个图书馆去看书，而且几乎都坐在同一个位置上。而另一个法律学生则通常坐在我桌子对面的那个位置上。我们两个人面对面对坐了好几个月，却从未说过一句话。”<sup>②</sup>洋洋数万言的《延寿新法》更是浸透出伍廷芳节制、镇静的个性特征。

个性的种类是多维的，既可指一个人的性格特征，又可喻为一个民族的性格特征。社会心理学认为：民族性即群体性。它是一个民族在现实稳定态度和习惯化了的行为方式所表现出来的个性

容闳：《西学东渐记》 岳麓书社 1985年版 第 61 页。

② 《美国宴会与美国礼节》 丁贤俊、喻作凤编：《伍廷芳集》下 中华书局 1993年版 第 908 页。

心理特征。狭隘意义上的个性与群体性的关系是特殊性与普遍性的关系。特殊性寓于普遍性之中，普遍性通过特殊性而发挥作用。就群体性而言，中华民族表现出的是谨慎的、节制的、随和平静的、中庸的特征。民族心理的自我性、排他性制约着个性的发挥，决定着个性不同的个人在现实生活中的得意与失意。通过对容闳、伍廷芳性格特征的比较，可以发现容闳自身个性特征同中华民族的群体特征相距甚远，甚至有些格格不入。西洋性多于中国性，这就是容闳在因循守旧的专制时代难以立足的重要原因。相反，伍廷芳在性格特征上基本与民族的群体性相契合，更符合中国人的审美情趣。因而，他在现实生活中就容易为时人所接受。李鸿章的一番话即是明证。1877年10月6日，李鸿章与伍廷芳首次会面。李鸿章甚为满意。他说：“伍廷芳‘虽住香港及外国多年，尚恂恂然有儒士风，绝无外洋习气，尤为难得。前出使英、美之郭侍郎（郭嵩焘）、陈太常（陈兰彬）争欲罗致之，盖有由矣’。”<sup>①</sup>在性格现象上，人类表现出了“同性相吸，异性相斥”的特征。以此为开端，在以后14年的幕僚生涯中，伍廷芳深得李鸿章的信任和重用，视为内政外交的左右手，并以此为台阶登上了一个个更新更广阔的历史舞台，在纵横捭阖的国际讲坛和宦海沉浮的近代政局中，释放着自己的光和热，为民族的富强、自由谱写着人生的华章。

“性格即命运”当是对容闳、伍廷芳人生悲、喜剧角色的概定。

纵观容闳、伍廷芳走过的人生历程，不难发现，虽同属文化边缘人，容闳是以失败者的形象而收场，伍廷芳则以成功者的姿态彪

炳史册。

### 三、双重变奏曲：从东方到西方——从西方到东方

由世界中心沦为边缘是中国近代社会的真实写照。透过这段悲惨历史，可以发现文化边缘人走过的清晰轨迹。从容闳经伍廷芳、严复到孙中山，代表了中国近代文化边缘人的群体趋向。由于生活时代的不同，早年的本土文化养成不同以及专业特长和个人性格的差异，导致了他们在近代中国不同命运和定位。单就早年的本土文化养成而言，容闳、伍廷芳、孙中山有极大的相似性，都已显示出与中国文化传统的疏离，其中尤以容闳为最。容闳生于广东香山南屏镇（今属珠海），家境贫寒，自小就进入传教士开办的免费“西塾”就读，逸出了普通中国学童固定的成长模式。父母的期待是“冀儿子能出人头地，得一翻译或洋务委员之优缺”，<sup>①</sup>而非科举中鹄，光宗耀祖。待留学归来竟成了外来人；“默念此暗礁与沙滩者，中国语不知当作何辞，久思不属，竟莫达其意”，<sup>②</sup>不得不补习汉文，培养国学根基。<sup>③</sup>伍廷芳、孙中山与容闳略有不同，两人都曾有过数年私塾经历，后因兴趣所致，转向西式教育，并最终完成学业，取得博士学位。相比之下，严复的国学基础是最好的。严复 1854 年生于福建侯官（今闽侯）阳岐乡，一个世代以医为业的家庭，从小接受正规的传统教育。6 岁就外傅，10 岁拜同邑宿儒黄

容闳：《西学东渐记》，岳麓书社 1985 年版，第 42 页。

同上，第 66 页。

③ 同上，第 68 页。

少岩为塾师。12岁时，父亲去世，科举之梦化为泡影。随后进入福州船政学堂，<sup>①</sup>游学英国接触到了西洋文明。从受传统文化浸淫的程度来看，四人呈依次递增的趋势，但都有背离传统教育的事实和经过，国学根基与同时代的读书人相比显得颇为肤浅。然而正因为有这样的知识结构，面对西洋文明他们才少了一些饱读经书之士的痛苦与笃慎，多了些拓荒者的喜悦与果敢。西学、西方的价值观念成为他们生命中的重要组成部分。他们充当了近代中国社会各个历史时期倡言西学的先锋、沟通东西文明的使者和新中国蓝图的绘制人。在国门初开，天朝上国大梦未醒之时，中国近代留美学生之父——容闳最早以边缘人的身份，为谋求中国的富强而奔走疾呼，促成了1872年首批幼童留学美国，开创了近代中国官派留学生的新纪元，揭开了近代中国人走出国门，求知识于世界的序幕。当国人还沉醉在模仿西洋坚船利炮的喜悦之时，留学英国的伍廷芳、严复寻求国家自强之道的眼光已经越过了器物层面，投向了西洋富强的核心——制度层次，并为此而学习西洋法律，诠释欧洲文化经典，揭示西国富强的奥秘——“使西方社会有机体最终达到富强的能力是蕴藏于个人中的能力。这些能力可以说是通过驾驭文明的利己来加强的，自由、平等、民主创造了使文明的利己得以实现的环境。在这样的环境中，人的体、智、德的潜在能力将得到充分的展现。”<sup>②</sup>他们还阐述了人类生存的法则——“优胜劣

王棊主编：《严复集》（五）中华书局1986年版，第1541页。

<sup>②</sup> [美]本杰明·史华兹：《寻求富强：严复与西方》江苏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

败 适者生存”。<sup>①</sup> 孙中山则博采各国之长 熔冶于一炉 为中国人民描绘了一幅以三民主义为支点的共和国蓝图。

先行者的拓荒 翻动了数千年农耕文明淤积下的厚厚土壤 为西洋文化在中国的播种提供了一方沃土。东西两大文明的嫁接成为可能。数以百万计的读书人以西洋文明为参照系，在同异质文明的比较中 甄别中外文化的优与劣 探求东方文明日渐式微的症结所在，找寻中国文化走向世界的历程。西学新元素的吸纳使中国传统的以人文主义为特色的儒家伦理价值系统有了更大的思维空间和反省天地，对于中国知识分子冲决封建罗网，挣脱专制桎梏 以开放的心态迎接时代的挑战 无疑起了举足轻重的作用。随之而来的便是中国社会风雷激荡的思想巨变。美国社会心理学家冷纳断言 假如一个社会中有许多人都成为‘过渡人’时 这个社会就开始由传统走向现代了。<sup>②</sup> 边缘人的文化先导地位由此奠定。

人类是创造历史的主体，个体的人都是历史演进中的阶段性产物，每个具体的人无不带有时代的烙印和痕迹。因而人们不能随心所欲地创造历史，而只能在历史给予的空间和时间内活动。历史主义的原理同样适用于近代中国的文化边缘人。作为生活在“双重价值系统”中的人和站在“传统——现代的连续体”上的人，近代中国的文化边缘人面对中国社会的现实 在导播西学、离异中学的同时，又都呈现出向传统回归的表征。留下了一条从东方到西方 又从西方到东方的生命轨迹。1855 年容闳身着西服回到阔

<sup>①</sup> 严复：《四十自述》 王栻主编：《严复集》。

<sup>②</sup> “边缘人”一词 文化学者、心理学家称之为“过渡人” 社会学家称之为“边际人”。叶南客：《边际人》 上海人民出版社 1996 年版 第 67 页。